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九二三年十二月)

(讲课提纲)

第一节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国

工人阶级的成长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伟大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伟大的民族。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封建社会，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会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在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地演变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通过发动多次的侵华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许多经济政治特权，把中国变为他们的商品销售场所和原料产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它对中国的侵略形式也由商品输出为主发展为资本输出为主。

它们在中国开设矿山，修筑铁路，设立银行，经理航运，直接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和军政大权，一个独立的中国逐渐地沦为各帝国主义共同宰割的半殖民地。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又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大批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这就进一步刺激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但是，帝国主义的入侵，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是极力阻碍和扼杀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这就使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地演变为半封建社会。

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中国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象两座大山一样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帝国主义利用封建势力作为统治中国的支柱，封建势力则把帝国主义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靠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广大人民，尤其是工人、农民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力的生活，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到它们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因此，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矛盾。”①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就成为近代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 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从鸦片战争开始，经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反帝运动、辛亥革命、直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前夜，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其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是太平天国革命和辛亥革命。

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六四年，由农民领袖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从广西金田村起义开始，扩展到十八个省份，坚持了十四年之久，建立号称“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政权，曾经给予中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这次革命斗争，显示了农民的主力军的作用。但是，太平天国革命在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联合镇压下终于失败。

一九一九年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一次具有全国规模的、在比较完全意义上开始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推翻了清朝的腐朽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这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一次有力的打击，大大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醒。但是，这次革命并没有彻底地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力下，资产阶级被迫妥协，政权很快被袁世凯所篡夺，于是，政权重新落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之手，革命归于失败。中国人民的这些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给帝国

主义和封建主义以沉重打击，具有不可磨灭的重大历史意义。

但是，这些革命斗争，由于历史的原因和阶级的局限，最终都失败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证明了一条真理：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都不能彻底解决中国的社会矛盾，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农民虽然人数众多，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并英勇善战，但是，由于他们受落后的生产方式的限制，看不清社会的发展和革命的前途，不可能提出代表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革命纲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们不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不能领导革命取得最后胜利。中国革命要取得最后胜利，必须由新兴的无产阶级领导，中国人民才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后，一九一二年三月就任所谓“中华民国大总统”，组织了代表大地主买办阶级的北洋军阀政府。从此中国开始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在各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分裂为三派。日本积极扶植皖系军阀段祺瑞，段祺瑞就成为袁世凯的继承人，掌握了北京反动政府，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同时，日本还扶植奉系军阀张作霖。英、美两国则积极扶植直系冯国章的势力与段祺瑞相对抗。此外，与北洋军阀有联系的还有唐继尧的滇系军阀和陆荣廷的桂系军阀，以及各省的大小军阀。各派军阀以不同帝国主义为后台，为扩充自己的地盘，经常进行激烈的争夺，军阀混战连年不绝。中国形成了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局面。

北洋军阀对内残害人民，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一九一五年五月，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使中国殖民化的“二十一条”，并先后二十次向帝国主义国家借债三亿七千万银元。一九一八年五月，段祺瑞又与日本签订所谓《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中国丧失了军事主权。

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把国家败坏到了极点，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使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更加激化。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

三 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新兴的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企业、中国早期的官僚资本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这三种近代工业企业而产生、发展起来的。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就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由此，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主要是海员、航运工人。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清政府开始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以及采矿、炼铁和纺织工业，又产生了一批近代的产业工人。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中国早期官僚资本企业出现的刺激和影响下，在中国社会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逐步扩大的条件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也出现了。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又有一部分地主、官僚、商人开始投资于新式工业，创办了一批资本主义的企业，在这些企业中又产生了一批工人，使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逐渐增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工矿企业的工

人达六十多万人。加上海员、铁路工人等共有一百多万人。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英、俄、德、法等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乘机得到了比较迅速的发展。在此期间，日、美帝国主义则乘机扩大了它在中国的经济势力，大量开办工矿企业。这样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迅速发展和日、美帝国主义大量开办企业，中国无产阶级也就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到一九一九年已经发展到大约二百万人左右。

中国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它是新的生产力代表，是中国社会最先进、最革命、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除了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许多特殊的优点。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经济地位极端低下，毫无政治权利，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因而，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具有特别坚决的反抗性和革命性。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下，中国资本主义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因而也就不可能象帝国主义国家那样的拿很高工资、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的工人贵族。所以，中国就没有象欧洲国家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除少数的工贼外，整个阶级都是革命的。第二，中国工人阶级分布特别集中，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几个大城市和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等大企业中，由于他们集中程度很高，非常有利于整个阶级的团结战斗，易于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第三，中国无产阶级多数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它与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因而，在革命斗争中易于与农民结成亲密的

联盟。

中国工人阶级显然也有些弱点：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历史较短（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平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还有封建传统和小生产的影响等，但是，因为他是最先进的阶级，而且还具备上述那些优点，所以，只有他才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最低层，身受的压迫和剥削以及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所少见的。然而，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出路也只有斗争、革命。因为剥削者和统治者是不会自动让步的，也不会自行灭亡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②中国工人阶级同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一样，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的。中国工人阶级初期的斗争，最早见之于记载的是一八五八年，为了反对英、法侵略军强占广州城，在香港举行近两万人的罢工。一九〇六年安源煤矿工人和一九一一年川汉铁路筑路工人也曾举行过起义，响应了当时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九一三年，汉阳兵工厂二千多工人，为反对以贬值纸币发给工人工资而举行罢工。一九一六年，天津法租界中国工人一千七百多人，为了反对法帝国主义扩大租界而罢工。这次罢工，在天津各界人民支持下，终于迫使法帝国主义放弃了完全霸占天津老西开地区的野心。这次斗争表现出了工人阶级的高度爱国热忱和彻底革命精神。

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上海纱厂的工人举行多次罢工，各

厂每次罢工人数平均在三、四千人以上。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一八年，有记载的罢工就有六十八次。而一九一九年一月至五月，罢工就达十九次。所有这些斗争，都显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坚强革命精神。但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一般都是自发性的经济斗争，无产阶级还处在自在阶级的状态。中国工人队伍的壮大，工人斗争的不断发展，迫切需要革命理论来指导，迫切需要有一个本阶级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工人运动的初步发展，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第二节 “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传播

一 新文化运动。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努力向西方学习，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进入空前黑暗的时期。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勾结，在思想文化领域里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外国侵略者积极鼓吹与支持尊孔活动。袁世凯篡权之后，对外卖国求荣，对内残害人民，尊孔复辟，把国家败坏到了极点。这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日益痛心于封建军阀统治下的黑暗和混乱，迫切要求中国的进步和改革，把禁锢人们的旧文化、旧思想看成是封建专制统治未能铲除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认识之下，一九一五年九月，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从一九一六年第二卷一号起，改为《新青年》），点燃了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革命烈火，掀起了一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即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与“科学”。“民主”即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科学”即反对迷信和盲从。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封建礼教和孔子学说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并开展了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文化对封建文化的激烈斗争，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运动。虽然不能真正给中国人民指出新的道路，但是，它严重地打击了长期统治中国人民的封建主义传统思想，使中国人民逐步从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奴役下解放出来。新文化运动，它激起了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是近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开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道路。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历十月二十五日），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地主资本家的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激发了革命斗争的热情，看到了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新觉醒。

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力地启示着中国的先进分子考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既然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那么中国可不可以走俄国人的道路呢？这样，他们就开始从向西方学习转而学习俄国。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③

十月革命爆发的消息传到中国以后，一些报刊、杂志都作了报导。如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上海《民国日报》，在一九一八年上半年，曾介绍和评论过十月革命。但是，他们歪曲了十月革命，并把布尔什维克主义说成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中国第一个把十月革命的真相告诉给中国人民的，则是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2号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在这两篇文章中，他热烈地欢呼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指出：“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德国马克思的学说”，“就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俄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他认为十月革命后世界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陈独秀和李大钊编辑的《每周评论》在北京创刊，除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外，也初步介绍了社会主义思想，报导了俄、德、匈等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并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等。此外，《晨报》还登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传记材料。其它一些介绍马克思的文章也先后在报刊上发表。

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逐渐产生了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正是这批人成了当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五四”爱国运动的骨干、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

二 “五四”爱国运动

一九一九年，中国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④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基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加紧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对内残酷压迫、对外妥协投降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它的导火线是一九一九年一月“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巴黎和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匈牙利）同盟国失败后，由战胜国英、美、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法国召开的所谓“和平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因一九一七年也对德宣战，参加了“协约国”方面，也是“战胜国”之一，当时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并在中国人民监督下提出要求取消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废除外国在中国的特权，收回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利等。会议在英、美、法帝国主义操纵下，拒绝了中国代表的要求，并决定由日本接受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当时，中国反动北洋军阀政府竟准备在宰割中国的“和平条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愤，蕴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反帝怒潮，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等口号，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陆宗舆（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章宗祥（驻日公使）。会后，不顾北洋军阀政府的威吓，进行了游行示威，痛打了藏在曹

宅的卖国贼章宗祥，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北洋军阀政府为了扑灭革命烈火，出动大批反动军警进行镇压，当场捕走学生三十余人。第二天，北京学生实行总罢课，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发通电、撒传单，到处讲演，坚决要求出席“和会”专使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接着，武汉、长沙、广州等各大、中城市学生纷纷起来响应。从北京到全国数十万青年学生英勇斗争，表现了先锋和桥梁作用。

“五四”运动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等推动并指导了这次运动。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揭露“巴黎和会”的本质，并亲自起草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积极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他还亲自上街进行爱国的宣传和散发传单，并提出强力拥护公理和平民征服政府的两大政治主张。

李大钊还通过学校、报刊和社团的活动，联系了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为运动作了组织准备。运动爆发后，他还经常和进步青年一起分析形势，研究策略，动员学生到全国各地去宣传，并及时地指出：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三大政治主张，给群众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六月三日，北洋军阀政府在北京大规模逮捕学生，这一野蛮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中国工人阶级挺身而出，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站到斗争的第一线，使运动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上海工人首先开始罢工，几乎各业工人全部参加，使整个上海陷入瘫痪。其中沪宁、沪杭两条铁路工人罢工，使交通断绝，影响甚大。接着，长辛店、唐山、杭州、九江、天津、济南等地工人以及其他一

些城市的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都纷纷举行罢工和游行。在工人大罢工的影响下，各重要城市的商人也相继举行罢市。运动迅速遍及全国二十多个省、一百二十多个城市。工人阶级在罢工斗争中，不畏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的武装镇压，不顾资本家的阻挠破坏，显示了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威力，震撼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至此，“五四”运动已由主要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参加发展为一个有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极为广泛的群众爱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上海，运动的主力由学生群众变为工人阶级。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强大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下令撤换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在“五四”运动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五四”运动取得重大胜利的重要因素。陈独秀、李大钊等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一个转折点。它是中国人民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表明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它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这个基础上，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工人运动的推动下，进一步认识到劳动群众的力量，开始走上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逐步完成了从激进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可见，“五四”运动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起来了，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

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中已进一步发展成为以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运动。这时，一些进步刊物和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出来，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逐渐成长。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李达、恽代英、蔡和森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他们组织革命团体，创办刊物，广泛地开展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工作。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者，是一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培育者。一九一九年五月，他在轮值主编《新青年》时，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并强调了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出阶级斗争“如一条金线，把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系起来”。他还介绍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序言》等重要著作的若干片断。一九二〇年三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了我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团结一批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他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开设的课程中，向学生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活动，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陈独秀也是很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一九二〇年前后写了许多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二〇年一月，他到上海活动，《新青年》杂志也随之移至上海，不久又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使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同年九月一日，他写了《谈政治》一书，批评了假社会主义和

无政府主义，歌颂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强权”和“列宁的劳动专政”，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明确宣布：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陈独秀和李大钊编辑的《新青年》杂志，在“五四”运动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先后发表的关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及通讯等，共一百三十七篇，成了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阵地。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的推动下，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也积极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湖南，毛泽东早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就和蔡和森、何叔衡等在长沙团结一批进步青年，组织了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一九一八年八月，他为了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到北京，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推动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湖南各界联合会，领导湖南各阶层人民开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一九一九年七月，他主编以湖南学生联合会名义出版的《湘江评论》，宣传社会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在《湘江评论》的第一、三、四期连续发表了《民众大联合》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活动，强调了俄国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俄罗斯民族的大联合的胜利。指出：“改造中国的根本办法，就是实行民众大联合”。他号召社会上各阶层人民，仿效俄国联合起来，革命就会成功。这篇文章曾经被许多报刊转载或推荐。一九二〇年初，他为了扩大湖南各阶层人民的反封建军阀斗争，第二次到北京，进一步研究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回到长沙后，他立即着手创办文化书社，组织俄罗斯研究

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引导青年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俄国革命经验。毛泽东后来回忆时说：“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⑤

在天津，周恩来、郭隆真和邓颖超等于一九一九年九月成立了“觉悟社”，出版了《觉悟》杂志，学习和研究新思想。为了进一步学习革命理论，了解和研究国际工人运动状况及经验，周恩来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旅欧学生和华工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在武汉，恽代英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他在“五四”运动后创办了“利群书社”、“共存社”，出版了“《武汉星期评论》”。在北京，瞿秋白创办了《新社会》旬刊。邓中夏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认真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尤其注意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济南，王烬美组织了“励新学会”，出版了《励新》半月刊。在广东，阮啸仙组织了“新学生社”。在四川有《星期日》、在浙江有《教育潮》等。当时在日本的李达，在法国的蔡和森等也积极研读并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当时，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团体和刊物如雨后春笋。据不完全统计，这时全国新出版的、一定程度上具有宣传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达二千多种。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书这时也在中国出版。

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

想的知识分子逐步同工人运动相结合，一九二〇年“五一”劳动节明显地表现了这种趋势。当时，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了《五一运动史》，介绍“五一”的由来，号召开展“劳动阶级的运动”。“五一”节那天，在北京，李大钊主持举行了有五百多工人和学生参加的纪念会，在会上散发了《劳工宣言》。《宣言》指出：“凡不做工而吃饭的官僚、政客、资本家……一律驱逐”，“把一切的土地、田园、工厂、机器、物料通通取回在我们手里”。在上海、广州、长沙等地，先进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也举行了纪念活动。各地“五一”节的纪念活动，都带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它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提高，也反映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世界观的转变，他们自觉地转向了工人阶级。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桥梁。

“五四”运动后，在各地早期共产主义者的领导和推动下，中国社会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高潮。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开始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极大恐惧，资产阶级也害怕这将会危及自己的阶级利益，于是他们便结成了统一战线，反对和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这种情况下，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开始分化。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公开站在反马克思主义方面，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样，在中国便展开了一场马克思主义者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斗争。